

# 从“圣经”到“材料”

## ——论教师教材观的转变

郭晓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圣经式”教材观是教育的社会控制职能和制度化教育强化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水平有限的反映,它不仅限制了教师教学的个性化和创造性,束缚了学生的学习空间和创造意识,而且割裂了课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材料式”教材观的兴起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改善教师的职业生活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提高教学质量。中国还缺少从整体上拒绝“圣经式”教材观的能力,但“材料式”教材观也有其发展的一定空间。

[关键词] 教师;教材观;圣经;材料;怀疑精神

[中图分类号] G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11(2001)06-0017-05

###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的课程改革使我国的中小学教材正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教材的多样化使教材作为教学中唯一“法定文化”的地位渐趋动摇;教材的功能定位也逐渐由“控制”和“规范”教学转向“为教学服务”。然而,“教材误用”现象在教学中却随处可见:教科书被当成“记忆的小册子”和“课堂上唯一的教学工具”,<sup>[1]</sup>甚至沦落为“教师让学生服从和强求一律的手段”。<sup>[2]</sup>教师仍以旧观念和方式驾驭着新的教材。这使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教师教材观的转变问题。

也许我们早该注意到教师的教材观对教师教学的重要影响。作为对教材的价值、作用、评价标准和处置方式的基本看法,教材观

从根本上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方式。一个持“神秘主义”教材观的教师,不仅不敢增删教材内容,甚至迷信教材上的教学方法;一个持“开放式教材观”的教师则往往以怀疑的精神对待教材,对“如何教”和“教什么”都试图找到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同的教材观将引导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构建完全不同的教学生活,包括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国教师那种“圣经式”的教材观使孩子们宛如用针钉住的蝴蝶,牢牢地被束缚在教材上,无奈地拍打着贫瘠的、获得了些许知识的翅膀。

### 二、“圣经式”教材观的特点、成因与危害

“圣经式”教材观是当今中国教师的主流型教材观,对其特点、成因作一深入分析,并展现其危害,实属必要。

#### (一)“圣经式”教材观的特点

总的看,“圣经式”教材观是一种封闭式的、崇尚权威的教材观。这种教材观在理论上使教师蜕变为教材的附庸,毫无自主与创造

[收稿日期] 2001-06-18

[作者简介] 郭晓明(1965-),湖南资兴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学论、课程论。

可言。因为：(1)在教材价值观上，它认为教材的价值在于“规范”教学。规范的实质是控制。控制的内容既包括教师的教，也包括学生的学；既涉及教的内容，也包括教的方式方法。此种观点往往使教材的编制就以“规范”教学为指针。(2)在对待教材的态度和方式上，它认为教师必须遵从教材，对其持有一颗“尊敬”之心。因为在这种教材观看来，教材既是师生交往的媒介，又是教学的标准和评价尺度；教学的目的就是“落实知识点”，使学生掌握教材所安排的内容；考试不能“超纲”，更不能“超本”。如同赛马要遵从“跑马道”的限制，教师也必须遵从教材的安排。(3)它认为教材的关键部分是内容纲要和练习，而非学习过程和学习活动方式的设计。因而，每当教材有什么变化时，教师们首先关心的是教材内容的增减和练习的变化，而不是教材编写指导思想的变化或学生学习活动方式设计上的变化。(4)“圣经式”教材观倾向于将教材视为唯一的教学资源，不相信教师能作为教学资源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去积极主动地选择和增添教学资源，更不主张教师自主开发教科书视野以外的教学资源。

## (二)“圣经式”教材观之成因

“圣经式”教材观的产生既与教育的社会职能和特定时期文化发展的特点有关，也与制度化教育的强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限制密切相联。

首先，“圣经式”教材观是教育的“社会控制职能”强化的结果。我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仔细想来，此种“重视”并不完全因为教育本身，更主要源自教育的社会控制职能。汉代兴太学，原因在于它是“教化之本源”。今天重视教育，“政党国家”维护一元化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的需要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教育要充当社会控制之有效手段，课程和教材就必须成为“法定文化”的忠实代言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实行严格的“审定制”或“国定制”。教材成为规范教师教学工作的手段，国家不仅

对“文本”及其种类严加控制，而且对“文本”的诠释也关切有加，不允许任何超越法定解释的努力存在。教师被限定为“法定文化”的“传递者”，只知教材的权威，而不知教育的目的为何物。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民教师”，本应首先有权利和资格拥有“人民”的“灵魂”，而事实往往恰非如此。

其次，“圣经式”教材观是制度化教育强化的结果。以班级授课制和完整学制为表征的制度化教育在西方形成于17世纪，在中国推行则是“废科举，兴学堂”以后。教育发展史表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教育的制度化必将带来教材的标准化和教师教学生活被“规训”的必然命运。因为制度化教育为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把工业管理模式运用于教育，追求教学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产生于近代的真正意义的“教科书”，其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教学的随意性，促进教育内容及其呈现方式的规范化。及至现代，教材开发中以泰勒(Tyler, R.)为代表的“目标模式”直接以工业管理中盛极一时的“泰罗制”为楷模。“泰罗制”建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管理上几乎不给行为主体留下任何自由。受其影响，教材被分解为一层层细小的、可操作的“目标”，这些目标支配着点点滴滴的教学内容，组成一个庞大的细密网络，显得“科学”而“精致”。这样的教材虽然提高了教学效率，使教师的教学获得了社会公共经验之基础，但也使课程与教师彻底分离。教科书这个本应由教师“驾驭”的“工具”，由于已变成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反而倒过来“驾驭”了教师。教师被限制于细小的目标和一大堆经精心编制的材料之中，沦落为基本失去“教”的“自由”与“权利”的“教书匠”，甚至外在于教师的教科书也成为教师形象的一部分，以至形成“无书则无师”的假象。

第三，“圣经式”教材观也是教育发展水平有限的结果，中国尚不具备彻底拒绝“圣经式”教材观的能力。原因是：其一，中国引进西方“制度化教育”虽已近一个世纪，但迄今为

止,“教育的‘制度化’程度未必很高,在总体上还谈不上‘制度化教育’的成熟”。<sup>[3]</sup>当“学习化社会”的呼声和教育的“非制度化”浪潮在西方汹涌澎湃的时候,中国却还有一大批学龄人口无法跨入学校大门,教育的“学校化”仍任重道远;其二,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不从整体上拒绝“英才教育”体系及其培养的虽无个性但不乏知识的人才;其三,拒绝“圣经式”教材观需以教师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即便在师范教育基础非常深厚、教育积累已达相当高度的英、美、澳等国,相当多教师都仍保留着传统的面孔。<sup>[4]</sup>中国教师整体素质之不佳,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教师连按既定教材实施教学都有困难,那么,利用教材对其进行某种规范确属必要。

第四,“圣经式”教材观还是社会文化发展缓慢的反映。儒家经典之所以能在中国独领风骚 2000 余年,根本原因是封建文化长期迟滞不前。今天的中国虽然也面临着急剧变化的世界文化潮流,但相对稳定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间的矛盾并不象发达国家那样激烈。

### (三)“圣经式”教材观的危害

“圣经式”教材观在中国虽还有其存续的某种理由,但它给学校教育教学所造成的危害却不可低估:首先,它割断了课程与丰富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其次,封闭的、缺少弹性的教材观使教师个人的教育力量与专家设定的教育内容之间无法建立起某种建设性联系;再次,它限制了学校的课堂生活空间和学生的学习活动空间;还有,它容易导致学生对教材乃至所有书本的盲目崇拜,扼杀其自主精神和创新能力;最后,它限制了教师的创造性及其教学的个性化,使教师无法在教学中找到其生命的价值和职业的乐趣。仅此几点,足见变革“圣经式”教材观的必要与紧迫。

## 三、“材料式”教材观的兴起与意义

### (一)“材料式”教材观的兴起

针对“圣经式”教材观的不足,我们必须

提倡一种“材料式”的教材观。

将教材仅仅当成教学的一种材料和工具的观点并非始于今日。从理论上讲,杜威最早抨击“教材中心”式的教学,认为必须破除课程与教学、教材与方法间的隔离,祛除教材在教学中的绝对权威,以使教学免于教材的支配。到 20 世纪 70 年代,课程开发中以斯坦浩斯(Stenhouse, L.)为代表的“过程模式”更明确反对教师与教材的分离,主张把课程研究和教材开发交给教师,因为在他们看来,课程并不是材料的堆集或教学大纲的罗列,而是对教学实践的一种具体的说明形式。兴起于 80 年代的后现代课程理论,深入分析了“泰勒模式”以技术理性指导课程设计的局限性,以及传统教材以控制为旨趣的基本性格,认为课程是生成性的,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而,“编写课程大纲或教学计划应该采用一种一般的、宽松的、多少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方式”。<sup>[5]</sup>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与我们共同探究,通过与文本对话探讨各种可能性”。<sup>[6]</sup>上述思想都将教材视为师生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文本”和“材料”,促进了“材料式”教材观的形成。

除课程和教育理论的推动外,“材料式”教材观在西方的兴起还有其广泛的文化背景和教育现实依据。20 世纪中叶以来,科技的加速发展,多元文化格局的深化,教育民主化进程的迅猛发展,都对教材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及其在教学中的绝对权威性提出了空前挑战,制度化教育和教科书的局限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从外部迅速弱化了教材对教学的控制职能;加之欧、美许多国家实行地方分权式课程管理政策,教师长期参与课程决策和教材开发,在课程教材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这一切都为“材料式”教材观在西方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材料式”教材观主张:(1)教材的价值不在于“控制”教学,而是为教学提供基础性文本,应祛除其神秘感;(2)教材只是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编制的“教学材料”,不具有作为教

学权威及裁决教学的力能。教学的根本依据是课程标准,达此标准所用的材料可以多样化;(3)教师不必绝对服从教材,有能力的教师可依自己的研究对教材作自主改造,教师应以怀疑的精神和研究的态度对待教材。

## (二)确立“材料式”教材观对当今中国教育意义

### 1. 有助于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提高教育质量

近 10 余年来,我们对课程改革给予了足够重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课程教材改革无论怎么重要,也只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块“基石”,充分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全面改善教学过程,也显得特别重要。美国学者古德莱德(Goodlad, J. I.)曾按所起作用的不同,将课程分为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的课程、运作的课程和经验的课程五个层次。前二者是专家设计的和政府颁布的课程,属“应然性课程”;后三者(教师领悟的、教学中实际运作的和学生实际经验的课程)才是“实然的课程”。“应然性课程”所预设的种种功能能否“现实地”体现在学生身上,其间还须教学领域的漫长运作。只有当“教师在其独特的和不断变化的教学情境中能以不同的解释教这课程”,<sup>[7]</sup>即当教师在其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创造性地研究教的内容和教的方法,对教材作革新性和批判性的使用时,课程的潜能才能得以现实展现。这表明,充分确立教师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释放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的张力,对提高教育质量的至关重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教法就不能成为教材的附庸,教师也必须从教材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材料式”教材观把教材由“圣经”还原为“材料”,从观念上为教师的解放开辟了道路,给课堂注入了活力,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

### 2. 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的职业生活状况,提高其职业素养

一种枯燥乏味并缺乏自我满足感以及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职业生活,不可能唤起从业

者的热情。不幸的是,这恰恰是今天中国大多数教师的职业体验!我们的教师被定位为既有教材的“传递者”,一个“按规定办事的人”。他们在“被规定”的状态下工作,只需沿袭枯燥的常规和指定的步骤,没有创造,没有挑战,因而无法体验到职业的乐趣和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在年复一年的劳作中,教师的生命活力被压住,职业灵魂渐渐枯萎,教师劳动本有的灵性、活力、挑战性、智慧性和人格的作用被一点点扼杀,教师只能在无奈中苦苦支撑。改变这一状况虽非教材观的变革这一因素所能奏效,但“材料式”教材观的确立确可使教师从精神上解放自己,找回其失落的角色意识,达成自我认同。教师一旦打破了对教材的崇拜和依赖,其生命活力就有可能得以焕发,劳动的本意和内在的欢乐便将得以显现,教师便可从一个屈从于规训的畏手畏脚的“教书匠”,转变为一个拥有专业自主性和生活活力的“教师”。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才能成长为一个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在课程教材领域逐步由“边缘”走向“中心”,“把课程还给教师”才真正获得可能。

### 3. 有助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活动方式,培养其主体性和批判精神

如前所述,“圣经式”教材观也压抑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记忆、背诵成为其基本的学习活动方式,富有情感的体悟无法在课堂中形成,探索的自由、学习的活力和儿童的灵性渐渐消失。教育在教给学生一大堆死的知识的同时,也夺走了他们思想的空间、看问题的“眼光”和批判的勇气。“材料式”教材观将学生从教材中解放出来,扩展其学习空间,赋予其“思想漫步”之自由,这必将大大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焕发其生命活力,并使其感受到学习及成长的乐趣,从而真正发展其主体性和批判精神。

## 四、转变教师教材观的基础与策略

转变教材观不只是选择一个立场,不同的教材观需有相应的现实基础。确立“材料

式”教材观在我国当前虽非易事,但近年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已为它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环境和某些现实基础;首先,近10年的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了教材的多样化,“审定制”和“一纲多本制”的推行使教材作为教学的唯一依据的权威性从体制上失去了可能。教师渐渐感受到了教材作为“教学材料”的本然属性。其次,我国近年推出的新一代教科书在设计思路已有变化,一些教科书同时为教学准备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更多的教材由要求教师“必须如何如何”转向“建议如何如何”,教材已开始主动放弃“权威者”的角色。第三,我国教师的素质与80年代初相比确有相当提升。高学历不再为大学教师所独有,“研究”也不再是高校教师的专利。一批优秀教师已有能力撇开教材及教参自主选择 and 开发教学材料,甚至参与课程研究和教材编制。这为“材料式”教材观的引入提供了可能。第四,随着中小学研究气氛和教师专业自主性的增强,教学的个性化已成为一部分教师的现实追求,这为“材料式”教材观的确立提供了内在动力。

当然,由于传统教学惯性的作用和社会发展的限制,教材观的转变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审慎地采取恰当策略。依笔者所见,将促进学生发展作为教学的最终目标,这是变革教师教材观的起点。只要以应试为核心的功利性目标仍统治中小学教

学一天,“圣经式”教材观在我国就仍将大行其道。此其一。其二,“将课程还给教师”,<sup>[8]</sup>从体制上保证教师的专业自主性,为教师参与课程教材研制提供可能,这是转变教师教材观的根本保证,故应进一步落实三级课程管理政策。其三,要下大力气弱化教材的“法定文化”色彩,强化教材的“民间性”及其服务职能,从教材设计上促进教材观的转变。为此,教材设计必须体现丰富性和弹性化。最后,从整体上拒绝“圣经式”教材观在中国还缺乏现实基础。故在教材的要求上,应区别不同素质的教师,并研究不同地区间的条件差异。

#### [参考文献]

- [1] [美]戴顿·教科书在教育中的作用[A]. 翟葆奎主编. 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下册)[C].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12.
- [2] 曾天山. 国外关于教科书功能争论的述评[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2):54.
- [3][4][8] 陈桂生. 学校教育原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73. 309. 304.
- [5] [6] (美)小威廉姆·多尔著. 后现代课程观[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 [7] M·本·佩雷茨(Ben Peretz). 课程潜能[A].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Z].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本文责任编辑:胡 菁)